比较文学与翻译

身份、选材、思想与评论: 宏观解读葛浩文

郭英剑 张丹丹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1), 125-133 页

内容提要: 葛浩文是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翻译者和传播者。本文试图从译者身份、译作选材、翻译思想以及译作评论四个方面多维度、多视角解读葛浩文,认为其翻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值得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中加以认真研究与借鉴。

关键词: 葛浩文 文学翻译 宏观解读

一、引言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因中国 文学翻译和研究而在英语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这一点在学术界、翻译界几无争议。自20世纪60 年代末投身中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工作至今,40余 年来,葛浩文翻译了萧红、老舍、巴金、白先勇、 李昂、贾平凹、李锐、苏童、王朔、莫言、虹影、 阿来、朱天文等20多位我国著名作家的50余部 作品,称他为当下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 代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当之无愧。随着2012年我 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莫言作 品主要译者的葛浩文也更加全面地进入到了研究 者的视野,随即成为中国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及 研究课题。"葛浩文"也随之成为了中国文学走进 英语世界的一面旗帜。

就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而言,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对葛浩文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语言表面(如对比原文和其译作,然后指出翻译的误译、漏译等问题,进而探讨其翻译方法、策略等),或是品评其译文的翻译伦理问题(如东方主义、英语霸权等),或是对译者进行主观价值判断(如批评葛浩文某些访谈的语言碎片),却较少有从宏观上解读葛浩文及其译作的研究。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周旋。翻译动机和目的影响着翻译选材、翻译策略

和翻译方法的选择,翻译过程不只是由译者一人独立完成,编辑与赞助人都会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此外,后续出版工作以及市场也会是翻译产品最终样貌呈现的关键因素。因此,翻译活动整个过程牵涉的因素众多,是一个宏观、繁复的工程。为此,葛浩文曾经感叹到:"我仍然比较乐意看到宏观式的剖析,希望他们能从更宽的视角评论我的译作"。²鉴于此,本文从葛浩文的译者身份、译作选材、翻译思想以及译作评论四个方面,试图多维度、多视角解读葛浩文,希望对其翻译进行一个宏观性研究。

二、译者身份: 学习者、研究者与传播者

围绕着身为翻译家的葛浩文,其身份实际上 是多元的。而这些多元的身份,有些容易被研究 者忽略。

首先,他是一位学习者。葛浩文是犹太后裔,生长于美国加州南部城市长堤(Long Beach,又译长滩),大学时就读的也是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分校。但在校时,葛浩文是一名差生,对学习毫无兴趣。毕业后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直接参军人伍,加入了美国海军。因为连他也感到阴差阳错的原因,葛浩文迅速被派到对他来说是一无所知的中国台湾。但恰恰是在服役期间,他才真正开始对学习感兴趣,也开始真正地学习中

¹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相关成果。

² 葛浩文, 我行我素: 葛浩文与浩文葛 (史国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4年第1期, 第41页。

文。后来,因为父亲病危,葛浩文返回美国。回国后,他进入了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攻读中国文学专业的硕士,随后又进入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葛浩文认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从此开始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翻译人生。这些经历,为葛浩文的双语能力和翻译能力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其次,他是一位研究者。葛浩文从攻读博士 学位时研究萧红入手,研究过中国古典小说、元 杂剧、鲁迅和左翼作家作品、田汉的戏剧、朱自 清的散文、萧军、萧红的小说等等,对于中国当 代文学,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有着更为深入的 研究,与当代众多著名作家如莫言、刘震云、苏 童等有密切交往。所以,称其对中国文学传统有 宏观的把控,并非言过其实。

作为研究者, 葛浩文有不少研究性论著问世。 1979年, 葛浩文在World Literature Today (《今 日世界文学》)上发表了"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ew Wenyi Bao" (《当代中国文 学和新<文艺报>》),通过《文艺报》1978年7 月复刊一事,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认为这预 示着中国文学艺术领域思想的解放, 标志着中 国文学创作的新生 (Goldblatt, 1979)。两年后 的1981年, 葛浩文又在《今日世界文学》上发 表 "Fresh flowers abloom again: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rebound" (《鲜花再度绽放:中国文学又一 春》),向西方学者展示中国文学已经走进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Goldblatt, 1981)。同年, 他的论 文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49" (《 现 代 中国小说: 1917-1949》) 对中国现代小说做了全 面梳理,并被收入Yang, Winston, L.Y. & Nathan K. Mao 主 编 的 Modern Chinese fiction: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 (《现代中国小说研究与欣赏导引——随笔与文 献》。此外,他和George Chen合著的"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现代中

国小说文献目录选》)被收入1981年哥伦比亚大 学出版社出版, 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合编 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 1919-1949》)。1989年, 葛浩文在Manoa第一卷的第一、二期合刊上发 表 "The return of art" (《艺术的回归》),向西方 社会介绍中国文学的发展,指出中国文学已经渐 渐走出了"文革",走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低谷 (Goldblatt, 1989)。2000年, 葛浩文在《今 日世界文学》再度发文, 题为 "The 'Saturnicon': forbidden food of Mo Yan"(《莫言的违禁食品》) 的论文, 探讨了莫言小说在寓言和讽刺意义上所 涉及的"吃人"问题,并指出莫言是最有想象力 的,也是最频繁涉及该主题的作家 (Goldblatt, 2000),这对西方学术界了解和理解莫言不无裨 益, 也是葛浩文将莫言引介到西方迈出的重要一 步。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葛浩文 才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中西文学的差异与不同风 格, 也才有了其所主张的独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再次,他是一位传播者。葛浩文编选了不少 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 其中不少都是中国现当代 文坛、作家、作品等的介绍性和研究性著述。一 方面,他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和推广中国现 当代文学,另一方面,他也站在西方的角度反观 和反省中国文学。这些著述包括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1980s: The Fourth Congress of Writers & Artists(《80年代中国文学: 第四届文艺工作者 会议文集》) (1982)、Worlds apart: recent Chinese writing and its audiences (《分离的世界: 近期中国 文学写作及读者》)(1990)、与刘绍铭(Joseph S. M. Lau) 合编的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选集》) (1995; 2007)、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 (1995)、与 Aili Mu、Julie Chiuh 合编的Loud Sparrows(《吵 闹的麻雀》)(2006)等。葛浩文的最新文集《葛 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1则收录了他从1975年 至2013年近40年的论文。这是葛浩文对中国现当

正文.indd 126

¹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

代文学的一种个人化梳理和研究,也称得上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见证。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葛浩文经常到中国来,也经常出现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热情奔走于各种场合去畅谈中国文学。他的演讲不仅让西方世界了解其研究和译作及中国文学的最新动态,还让中国学界了解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态度和接受情况。正因为如此,葛浩文在翻译中,才不仅仅是作为翻译家来从事翻译,而是考虑了诸多的因素,特别是将中国文学如何传播出去、如何被西方英语世界所接受,并将这样的理念体现在了个人的翻译实践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说,葛浩文是具有复合型身份特征的翻译家。正是因为既兼具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身份,其研究先于翻译并服务于翻译,并成为其翻译的基础,才使葛浩文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译入英语世界的顶尖翻译家。

三、译作选材:作者、读者与市场

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也是学术界和翻译界讨论众多的一个话题。在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成 为其中重要的一个分支。然而,一个毫无争议的 事实是,多年来,中国文学虽然有不少外文译本, 英语译本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但这些译本在 海外特别是英语世界当中,几乎没有影响力。其 结果是,中国文学在国外不为人知,未得到其应 有的地位。有不少了解中国文学传统者(中外皆 有),都将这一结果归咎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水平太 低所致。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海外 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最大的原因还是语言文化的 天然隔阂,中西文学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形式 和叙事方式,决定了中西文学之间巨大的鸿沟。 比如我们看来十分优美动人的篇章,也许在外国 读者眼中就会变成连篇累牍、不知所云的"天

正文.indd 127

书"。¹ 这种解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中国文学翻译的整体水平不高,似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纵观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译介简史,我们不难发现,除了由西方人所主导的中国文学(包括中国文化)的经典之外,其他主要以中国翻译家为主所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中少有影响,更没有被英语世界所接受,遑论成为英语世界中所公认的优秀或者经典之作了。

应该说,直到葛浩文为代表的翻译家出现,才使得中国文学真正开始被英语世界所认识、接受并欣赏,而不再被单纯地作为"他者"去看待。特别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葛浩文的译本自然成为我国现当代文学译入英语世界最成功的典范。为此,我们应该对他的翻译选材标准进行客观地、深入地探讨,看他究竟怎样去选材,有着怎样的翻译思想,又采用了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根据我们的观察, 葛浩文的复合型身份特征 造就了他特有的翻译选材标准。这些标准, 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主席、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翻译学院陶忘机(John Balcom)教授指出,文学翻译在美国仅占3%的市场份额,而中国文学英译作品大约是每年出版一本(2012)。² 与此相呼应,2014年4月20-22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葛浩文曾直言"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英、美等国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出版社不太愿意出版中文小说的翻译,即使出版了也甚少做促销活动。" ³ 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换句话说,怎么样才能更加实际有效地使得翻译为人所接受呢?

在葛浩文看来,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选择作品的标准。对此,葛浩文强调的是"介绍谁、翻译什么、何时介绍,何时翻译"¹,这也就是主张翻

¹ 季进,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为例,《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31页。

² 转引自马会娟, 英语世界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 现状与问题,《中国翻译》, 2013年第1期, 第65页。

³ 傅小平,中国作家的思想还未真正走向世界?《文学报》,2014年5月9日。

译选材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其中,"介 绍谁和翻译什么",自然是说要选择优秀作家的优 秀作品。在葛浩文看来,如果没有一批题材宽泛、 技巧出众的中国小说和诗歌的英译本, 中国作品 很难在艺术上感染西方作家。2同时,何时介绍 与何时翻译, 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适时的 推介,没有合适的时间节点,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节拍,即便是有好的译本,也难以产生理想的效 果。他以其翻译的后现代小说苏童的《米》、莫言 的《酒国》、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为例,诠释 了翻译选材的适宜性。3

第二,市场导向和"洋人"眼光。相对于中 国文学, 以英语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处于强势 地位并有着发达而自足的文学传统、阅读取向和 评判标准。而与此同时,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 中国当代文学本身发展得并不充分, 在整体思想 深度和艺术价值上难以与西方相抗衡, 加上西方 读者长期以来对中国可能具有的固有偏见,也就 对当下中国人的真实经验与审美表达不可避免地 带有"他者"乃至东方主义式的凝视。在这样的 实际语境下,如何有效地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被西方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就既要有纵观全 局的眼光, 也要有深知西方英语世界后而采取的 应对策略。

葛浩文曾直言:"我看一个作品,哪怕中国人 特喜欢,如果我觉得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 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4在 这里, 葛浩文的这句直白的话, 可能令不少中国 人感到不悦。但我们认为,透过字面意思,大体 上可以看到葛浩文的翻译选材理念:首先,在选 材上,他会提前考虑该书的市场走向,也可以说 是其选材有以市场为导向的特征; 其次, 在选材 上,他强调自己作为西方人的身份,实际上是站 在读者的角度,在考虑未来读者的接受度与接受 面的问题。最后,无论是市场还是读者,其背后

的重要因素,还应该归结为作品本身的力量,是 否具有在英语世界中被接受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 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是否具有世界性。由此而言, 葛浩文的选材标准与"功利主义"无关,往小的 方面说,是在探讨译作未来的命运,往大的方面 说,则与译作的传播学有关。从译介学和接受美 学的角度来看,没有被阅读的文本无法产生任何 影响,实际上等于不存在。翻译绝对不是个单向 过程, 译入语文化也绝不是被动的、只能接受、 没有付出的一种体系。事实正相反,译入语文化 往往是主宰译作的最大因素。翻译可以说是两种 语言文化就某一命题所作的谈判, 虽然是互为消 长,但也缺一不能成其事。如果说译作是果,则 原文的语言文化与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同样是因, 所以, 假如译者抱着传教士式的热诚去推广原文 文化,而妄顾译入语文化的即成规范,努力就会 是徒然的。5就此而言, 葛浩文的选材标准, 值得 我们深入思考。

由以上两种标准,人们是否可以认为, 葛浩 文只是以这两种标准为唯一标准、而对哪怕是中 国最优秀的作品也不管不顾呢? 是否是仅仅照顾 英语世界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以此为选材的全 部标准呢?事实并非如此。

迄今为止, 葛浩文已经出版了50多部译著, 有些是出于他的兴趣,有些则是出版社的约稿。 "我(葛浩文)抽屉里有五六本小说,已经翻译得 差不多了或者已经翻译到一半了,(之所以没有继 续进行,)很简单,就是卖不出去",成了"压在 手里的好货"。 6 从其翻译作品来看, 葛浩文的选 材确实是比较符合美国和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期 待和兴趣, 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在翻译中国文 学时,就是坚守一条底线,必须得以描写和揭露 黑暗为主,进而有着一种"东方主义"的文学翻 译观。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述葛浩文所具有的 清晰的选材思路与标准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¹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² 同上. 第198页.

³ 参见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99-203页。 4 转引自姜玉琴、乔国强,葛浩文的"东方主义"文学翻译观,《文学报》,2014年3月13日。

⁵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⁶ 赋格、张英、葛浩文谈中国文学、《南方周末报》、2008年3月27日。

首先,我们中国的作家就是这样写的(比如作品 以描写和揭露黑暗为主),就不能怪翻译家这样选 择,还不要说这样的作品本身在国内(我们不提 国外)早已是得过大奖、深受读者的喜爱了;其 次,任何人都有猎奇心理,尤其是大众读者,这 与一个人的国籍无关。况且自古以来,中国乃至 东方在西方人眼里就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致 使西方人对中国乃至东方一直保有一种猎奇心理, 这是历史所造就的。现在,距"东方主义"的提 出已经近30年,随着全球化观念的深入以及凭借 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如果我们自己 仍时时刻刻硬拿"东方主义"去解构西方人(包 括译者)所谓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猎奇心理和认 知态度, 那是不是说"东方主义"在被更多的中 国人模式化及异化了之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 的东方主义",成为了中国人视自我亦或西方对中 国意识形态的一种固化模式呢?

葛浩文的选材标准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 中国文学由翻译而进入世界文学, 为世界所理解, 所接受, 所欣赏, 并使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还需 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学的引进促进 了国内文学翻译的大潮,进入20世纪后,翻译文 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呈直线上升趋势。1 此时, 我国本土作家对待域外小说的态度, 大致经历了 从漠视到消极接受, 到积极接受, 到自觉模仿, 再到力图摆脱模仿走向独立创造的发展过程,形 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接受外国文学的活动周期。2 我们换位思考,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接 受和影响也同样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 就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现状而言,还处于与西 方文学传统、诗学、意识形态及观念碰撞的初级 阶段, 我们可以分步骤、分阶段、有计划地译介 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在目前的初级阶段,我们 需要汉学家和母语为译入语的译者选择适合译入 语国家读者口味的作品先行翻译。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 葛浩文的选材标准应 该得到客观深入的探讨和评价。英语世界的译人 语文化规范、诗学以及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等因 素在翻译和接受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也应该值 得我们认真研究。

四、翻译思想:游走于译者与作者之间

就翻译思想而言,葛浩文对此有过众多的论述,研究者对此也有很多评论。比如,他曾经说过,"毋庸置疑,翻译作品的性质和质量,对跨语言传播/跨文化交际的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忠实性(准确),理解性和文学性等要素能确定译文的高下。" 3 像这样近乎四平八稳的论述人们还可以找到很多,但在我们看来,葛浩文翻译思想的精髓,就落在"读者"和"作者"这两个层面,但首先是"读者"。

葛浩文非常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译者就像编辑一样,其首要的职责是对读者不是对作者负责。⁴ 正因为如此,他曾经明确表示,"意译"派在出版方面更胜一筹,因为在那些"可译的"小说里,"可读性好"的译作才能出版。⁵ 由此可见,在翻译上他是"意译派",看重的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和"可读性"。在我们看来,他所以强调读者的重要性,原因有二,第一,他所强调的"可译的"和"可读性好"都是从译入语的语言/文学规范和译入语的读者接受角度进行筛选和考量的。而这种翻译思想又与前述的选材标准相契合。第二,他深知作为译者的使命所在,也深知译者的位置在哪里。正如他所说:"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毫无疑问,这里的"外国人"其实主要是

¹ 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²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 第23页。

³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⁴ Andrea Lingenfelt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 Full Tilt: A Journal of East-Asian Poetry, Translation and Arts, Summer 2007 issue of "the Interview Issue." See: 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asp?1 No=16&Period=2

⁵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指外国读者。

虽然葛浩文首先强调读者的重要性,但并不是忽略作者的重要性,作者同样重要,不过是有先后顺序之不同。正如葛浩文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过那样,翻译要服侍的是两个主人,作者和读者。² 葛浩文重视作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哪些优秀的作家值得翻译到英语世界之中?第二,哪些优秀的作品应该翻译也可以经过翻译进入到英语世界之中?为此,他曾提出翻译要"对得起作者"的说法。³ 他曾对伊万·金将老舍《骆驼祥子》的悲剧结局改为喜剧结局不予认可,提出重译《骆驼祥子》计划,并表示"原因很明确,并不在于原译本过于陈旧等历史原因,而是要'对得起'老舍","译本既不能'歪曲了原著',也不能'没了老舍作品的味儿'"。⁴

在我们看来,译者能够游走于读者与作者之间,实际上就是游走在两国文化之间。这需要对两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世界有深刻的了解才可以做到。我们知道,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他对中西小说的历史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这才形成了他独有的翻译思想。

与诗词歌赋相比,小说并非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单单就数量而言,也就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才获得了正式的文学地位,逐渐在中国成了气候,中国成为小说大国那已经是20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与此同时,西方的小说发展则完全不同。西方小说(novel)经过长时期的演变到了二十世纪已经基本定形了,怎么写才算是好作品,有不成文的约定5。中国的小说和西方的novel之间存在差异,中国小说翻译成英文,意味着翻译文学进入了英语世界小说系统,英语读者和评论家是以novel的标准看待及评判的。因此,中国小说的一些写法在中国作家和

读者看来理所当然,但放到西方 novel 的文学传统 里有时就变成一种缺失。'这样的差异性认识,对 于翻译来说,不可或缺。当一部作品想要走出边 界并得到译入语国家读者的认可,尤其是弱势或 边缘文学想要走进强势或中心文学系统时,如果 主体文化没有内部的革新需求,也许是绕不过强 势文学系统中的一些"潜规则"的。中国小说迁 移到英语文化中并由英语文化系统加以重新呈现 时,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必然会由完全不同的语言 符号造成损伤。如果认为不同文化在语言的迁移 中是等值的,或是忽略这种迁移中的变异,那么 对两种文化都是不公平的。理解这一点,对于理 解葛浩文的翻译思想至关重要。

那么,葛浩文是如何将这样的翻译思想体现 在其翻译作品之中的呢?换句话说,在考虑到读 者接受和作者原意传达的基础上,葛浩文怎样去 体现其翻译思想呢?

第一,在征询作者意见的基础上,在翻译中 局部地对作品加以改变。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 曾经多次提到这样的案例。比如, 他在翻译刘震 云的小说《手机》时,曾经提议作者允许他将第 二部分的第一节,大概有6-8页的样子,放在小 说的起首。因为该小说采取的是时间先后的叙述 方式,从30年前回忆起,等到进入现代社会时, 就已经是在40页之后了。在他看来,在中文世界 中,这没有问题,因为中国人喜欢按时间顺序讲 故事, 但在英语世界中, 读者一定会认为这本小 说很无聊。经他改变之后, 小说先从当代社会谈 起,然后再有倒叙的方式,这在英语世界中,读 者完全可以接受。⁷ 事实证明, 葛浩文的翻译策 略是正确的。在与他合作的中国作家之中,这种 现象是常见的。他曾经谈到说,莫言曾经跟他说, 这个作品已经不是我的了,这个作品是您的了,

正文.indd 130

¹ 转引自曹顺庆、王苗苗、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26页。

² 葛浩文, 我行我素: 葛浩文与浩文葛 (史国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4年第1期, 第45页。

³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13页

⁴ 刘云虹、许钧,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 《外国语》, 2014年第3期, 第12-13页。

⁵ 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文学报》,2014年7月3日。

⁶ 同上。

⁷ Andrea Lingenfelt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 Full Tilt: A Journal of East-Asian Poetry, Translation and Arts, Summer 2007 issue of "the Interview Issue." See: 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asp?I_No=16&Period=2

它只不过写有我的名字和作品上有我的版权而已, 但(您在翻译时),它就是您的了。葛浩文对这样 的态度极为赞赏。1像这样的翻译,是带有葛浩文 标志的"翻译"。并非所有翻译家都可以与作家有 如此密切之关系, 也未必能获得作家如此这般的 信任。

第二,在具体文本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见, 葛浩文绝不会采用所谓忠实于原文的直译法,而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译", 甚至比"意译"还要 更严重一点,他的翻译在某些地方或者某些部分, 采用的是"改写"(rewrite)式的翻译。在我们看 来,所谓"改写式翻译",是根据原文的深刻内 涵,在译入语中寻求更加恰当的、地道的语汇而 非仅只是与原文词语对应的语汇去呈现。

比如,在姜戎的《狼图腾》中有这样一句话: "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 草原狼不可牵。" 葛浩文对此的译文是: "You can tame a bear, a tiger, a lion, and an elephant, but you cannot tame a Mongolian wolf."针对"牵"字的 翻译,就连懂英语的作者(姜戎)都认为,应该 用 "pull" (拉、拽、牵), 因为 "tame" (驯服) 这个词不够有力,无法表达狼在被绳索拉紧后, 四爪流血但还是一动不动的犟。还有人建议用 "tug" (猛拉、猛拽、用力扯)。也许从字面意义 上讲 "pull" 和 "tug" 与汉语 "牵"字的意象比 "tame"更加吻合,但是对英语读者来说,"pull" 把一个严肃的场景变成了一个滑稽的画面。要是 动物不乐意的话是拉不走的,所以葛氏认为用 "pull"来翻译"拉"是行不通的。而在英语中, "tame"所诠释的就是狼的桀骜不驯,马戏团可 以看到驯过的熊、老虎、狮子或大象,但是没有 驯过的狼。因此"tame"所传递的信息已经很清 楚了。2

正文.indd 131

再如,葛浩文在姜戎《狼图腾》的翻译过程 中, 甚至对原文中过多涉及中国历史与文学典故 的部分,一律做了删减处理;而在可能妨碍读 者接受的地方,又有意识地在正文相应部分增 补相关背景信息。3在2013年5月美国普渡大学 (Purdue University) 举办的第六届中美比较文学 研讨会上, 葛浩文在做主旨发言后回答问题时, 曾提到中国小说中经常出现一些短句如:"他坐在 桌子旁边。他站了起来。他走到门口。"他认为, 在英语翻译时,他根本无法参照原文这样去"忠 实地"翻译,而只能按照英语思维把这些短句整 合成英语读者熟悉的一个长句, 以免看上去支离 破碎又拖沓冗长。

当然,对于这样的"改写式翻译",人们的评 价就显得千差万别, 褒贬不一了。有学者认为, 葛浩文的翻译特殊, 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的翻译, 而是"连译带改"。4有学者认为,经过葛浩文翻 译的小说,已经不再是中国文学,而是带有英美 文学特征了。还有学者通过基于语料库的考察, 从数字上更有力地证明了葛氏的翻译小说具有明 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的特征, 而且与普遍的英 语翻译文本有明显的差异。5

葛浩文对此的辩解是,"我做翻译不须借助高 深的理论,而是像作家或诗人那样,一边写,一 边摸索最恰当的表达方式"。6有学者指出,葛浩 文在翻译中国小说之余大量阅读本土英语小说, 学习了解作者如何遣词造句,同时指出很多做翻 译的人英文书籍读得不够。⁷ 我们对此的解读是, 宏观而言, 葛浩文作为译者不仅仅关心所译文本 的内容, 更关怀文本之外的接受世界, 尤其是译 入语为母语的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和文学规范。 就遣词造句来说, 葛浩文更注重原文在英语语境 中的微妙之处,他希望只有英语为母语的人能够

¹ Andrea Lingenfelter, "Howard Goldblatt on How the Navy Saved His Life and Why Literary Translation Matters," Full Tilt: A Journal of East-Asian Poetry, Translation and Arts, Summer 2007 issue of "the Interview Issue." See: http://fulltilt.ncu.edu.tw/Content. asp?I_No=16&Period=2

² 葛浩文, 我行我素: 葛浩文与浩文葛 (史国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4年第1期, 第47页。

³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13页。 4 谢天振,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启示,《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14日。

⁵ 侯羽、刘泽权、刘鼎甲,基于语料库的葛浩文译者风格分析——以莫言小说英译本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年第2 期, 第72-78页。

⁶ 葛浩文, 我行我素: 葛浩文与浩文葛 (史国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4年第1期, 第37页。

⁷ 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第 57页。

看得懂翻译文本并会产生共鸣,进而拉近读者与 翻译文本之间以及和原作者之间的距离。

葛浩文曾说,"译者是人类精神的信使。翻译是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创造性的价值生成。虽然翻译中对原著而言会失去一些东西,但这不是译者的错,翻译是必须的。有人说,90%的翻译是不好的。但是,谁不想做那余下的10%呢?"」从葛浩文的话中,我们看到了译者的伟大以及无奈。原作随着出版的那一刻就已经冰封凝结,而翻译却是永无止境的工程。尽管翻译是欠额的,但也只有依靠翻译,我们才能在时间、空间上延续优秀作品的生命²。这,当然是译者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五、译作评论:复杂性、世界性与主观性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和翻译界对葛浩文的 诸多评价之中,有人热捧、有人中立,但更多 的似乎是各种批评。为此,葛浩文希望人们对 他的研究进行宏观式的剖析,从更宽的视角评 论其译作³。本文对这位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投 身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翻译者和传播者进行较为 全面的宏观评价,不敢自诩客观、公平,但从对 他的各种研究特别是对其译作的评论中,我们至 少可以看到如下三个方面,是过去在翻译批评当 中被忽视的,或者说强调得还不够的,因此,也 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或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一,翻译的复杂性。翻译不仅是属于翻译家的产品与成果,它还是翻译过程的一种呈现,其中包含了作者、编辑、经纪人、出版社乃至学者与读者等各种因素。虽然人们常说翻译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翻译得好,读者会认为是原作好,译者的功劳往往会被忘记或者忽略,但一旦被认为翻译得不好,译者就要承担所有的骂

名。这其中的逻辑是把翻译完全归结为译者一人 所为。其实, 现当代历史上的翻译, 早已不再是 过去的模样了。我们不妨来看看葛浩文是如何翻 译杨绛的《干校六记》的。最终以英文呈现的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 实则为葛浩 文、编辑、出版商、作者、学者以及读者合力而 为4 (参见许诗焱, 2016)。该书英文题目, 先由 葛浩文与高克毅 (George Kao) 和宋琪 (Stephen Soong) 这两位编辑共同讨论, 然后又征询了当 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访学的闵福德 (John Minford) 的意见,这才最后确定下来。该 书中六个小标题的翻译,葛浩文也都征求了上述 两位编辑的意见后才确定。此外, 作者杨绛也参 与了译稿的修改。《干校六记》的原文只有大约 33000字,而流通于《干校六记》翻译过程中的 互动信件就多达83封,远远超出了原文字数的数 倍。这其中包括小到一字一词的商讨,大到有关 历史、文化内容译介的权衡。由此,这篇译作所 折射出的译者、编辑、作者、学者等人的努力可 见一斑。今天,翻译产品承载的也许不仅仅是译 者从源语到译语的简单转换,还包括其他参与人 的意见、两种文化之间的周旋、以及多种翻译选 择权衡下的妥协和考量等丰富内涵。因此,翻译 批评若绕开翻译过程的研究, 而只把译本完全归 结于译者,恐怕难以探究翻译本质,难免导致翻 译批评不客观。

第二,翻译的世界性。除了单纯从语言角度 去认识翻译与翻译批评之外,我们还应该从世界 文学的角度去反思翻译及其批评。现如今,在倡导"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把"世界文学"划分 为国别文学乃至东西方文学,划分为第一世界和 第三世界文学,更多的应该是为了学科划分、学 术研究之需要,虽然历史上确有西方文学高于东 方文学这类充满歧视的现象,也确实有霸权文化 与反霸权文化的斗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世

¹ 朱自奋、葛浩文: 作者与译者之间是一种不安、互惠互利的关系,《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1月8日。

² Howard Goldblatt, The Writing Life, *The Washington Post*, Sunday, April 28, 2002.

³ 葛浩文, 我行我素. 葛浩文与浩文葛 (史国强译), 《中国比较文学》, 2014年第1期, 第41页。

⁴ 参见许诗焱,基于翻译过程的葛浩文翻译研究——以《干校六记》英译本的翻译过程为例,《外国语》,2016年第5期,第95-103页。

界文学被广泛接受的今天,过分强调第三世界文学被边缘化,并且为此要不断进行文化上的反渗透,反倒会让人觉得有俯视亦或自卑于第三世界文学之嫌。葛浩文在批评作家刘索拉的话"这个世界严重西化,凡事都要以'欧洲标准'或'美国标准'来评断"时就曾指出:"尽管'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充满了经济的,乃至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色彩,但是过分片面地强调各自的文化,又何尝没有一种东方主义或偶尔与之相对的西方主义味道呢?"「人人平等的理想永远存在,但在一个并不平等且拥有极端复杂性的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如何看待各国文学及其文学遗产,如何使各国文学传统进入世界文学之中,如何使他们可以得到公平的评价,则值得进一步深思。

第三,评价的主观性。翻译批评难免带有个人好恶,评价中彰显主体性也在情理之中,评价中每个人所使用的标准也难以统一。与此相矛盾的是,翻译本身就是仁智互见的过程,而重要的译作或者经典译作往往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是译者、赞助人、翻译目的、社会文化语境、诗学观念等各种内外冲力碰撞后的产物。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悖论的一面就是,翻译评价总是会远远超出好坏、对错二元分明的评论维度。我们以为,对于像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来说,评价他及其译作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以历史为经,以译介各因素为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只有这样,才

能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结语

本文从译者身份、译作选材、翻译思想以及 译作评论这四个方面, 试图多维度多视角地解读 翻译家葛浩文。作为中国文学的研究者、翻译者 和传播者, 葛浩文熟识中国文学传统, 又能以其 独特的翻译技巧去赢得英语世界中读者的共鸣, 进而达到推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目的, 其翻 译思想及其翻译实践值得我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 的国家战略中加以认真研究与借鉴。葛浩文无疑 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同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需要像 葛浩文这样热爱并能驾驭中国语言与文学,同时 又深谙英语及英语世界诗学、意识形态等要素, 并数十年如一日持续关注、研究中国作家、作品 并不间断翻译和加以推介的翻译家。在对这样的 翻译家及其译作进行评价时,除了关注和细读文 本外,还应该多维度、多侧面、系统化地诠释译 者及译作, 也应该以宏观的视野和更宽广的视角 研究译者和其译作。

(作者单位:郭英剑,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张丹丹,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

¹ 葛浩文、《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98-199页。